
* 综 述 *

楔劈技术、沟裂技术和雕刻器^①

林圣龙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100044)

Q981

笔者(Lin Shenglong, 1991)曾指出, 与欧洲相比,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中生产骨角器毛坯的楔劈技术(Wedge technique)和沟裂技术(Groove and splinter technique)至今尚无记录, 同时雕刻器也很少。本文综合了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材料, 就此问题作一综述。

在欧洲,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为了分解鹿角、骨头和象牙, 以得到制作骨角工具的毛坯, 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技术: 楔劈技术和沟裂技术(Sonneville-Bordes, 1963)。

所谓楔劈技术就是用一块一面是斜面的鹿角作为楔子来纵向破开一个鹿角或别的东西。在法国 Abri Pataud 遗址的 Level 3(Perigordian VI)中, 就有使用这种技术的证据: 先用雕刻器在鹿角主枝中部的某一个地方切割或刻划出一条长 40 到 50 毫米的沟, 用来插入楔子, 鹿角就沿着沟的轴被破开。有一件 antler polisher 似乎就是这样被劈开的。在这里也发现一件鹿角主枝破片, 可能是作为楔子用的(图 2 之 3)。在 Level 5 中, 有几件非常清楚的楔子标本(Bricker and David, 1984)。

所谓沟裂技术就是在鹿角的主枝上切割或刻划出两道平行的、截面成 V 字形的沟, 一直到穿透鹿角的坚硬的外壁, 然后取出两沟之间的中间部分, 这样就得到纵长的鹿角片, 成为制作各种器物的毛坯。曾经发掘英国著名的中石器时代的 star Carr 遗址的 Clark and Thompson(1953)专门介绍了这种技术。

作为第一步, 鹿角通常需要预先进行修理, 打掉靠近基部的分枝和角环。史前人类也利用自然脱落的和由头骨上破裂下来的鹿角。对鹿角上人工切割的沟的研究, 用新鲜鹿角做的实验以及与爱斯基摩人的实践的比较表明, 在沟裂技术中使用的主要工具是用燧石做的雕刻器。很有意义的是, 在 Star Carr 遗址发现的石器组合中, 数量最多的是雕刻器。通过对没有完成加工的标本的考察表明, 史前工匠是循着鹿角上的自然沟纹来刻沟的。他首先在主枝上刻划出沟的轮廓, 然后逐渐加深, 最后用杠杆把角片撬出来。Thompson 做了实验, 如果把鹿角放在水里浸泡 4 天就可以使它变软, 可以大大减轻刻沟的劳动。在 Star Carr 遗址, 大约三分之二的鹿角是从刚被杀死的动物的头骨上破下来的, 可以直接用来加工。

①收稿日期: 1992-0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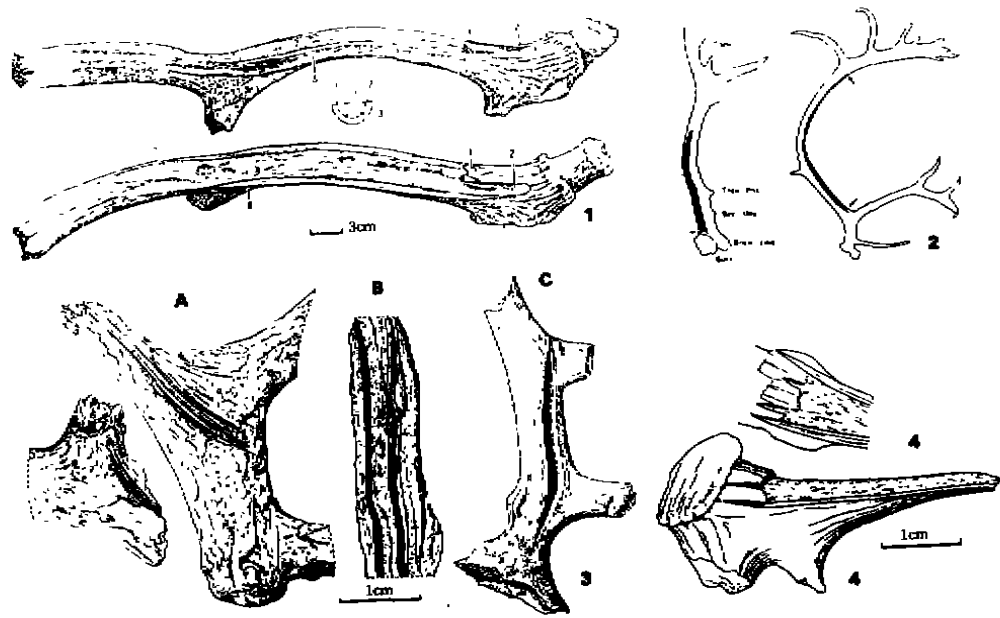


图1 沟裂技术 Groove and splinter technique

1. Star Carr 发现的赤鹿角: 至少已用沟裂技术取下两块角片; 而另一块角片已用沟划定, 但没有完成。

2. 赤鹿(左)和驯鹿(右)角, 显示以沟裂技术通常取下角片的部分的位置。

3. 由法国 Basse Pyrenees 的 Isturitz 发现的驯鹿角片, 显示了沟裂技术的痕迹。

A. Mousterian level (Salle de Saint-Martin)(笔者按: 文中已说明可能来自 Aurignacian level)。

B. Aurignacian level (Salle de Saint-Martin)。

C. Aurignacian level (Grande Salle)。

4. 由 Valencia 的 Parpallo 的 Magdalenian IV level 发现的赤鹿的自然脱落的角的基部, 显示了沟裂技术的痕迹。

(依 Clark and Thompson, 1953)

虽然在有的鹿角上只取下了一块角片, 但是, 一般说来, 从一个鹿角的主枝上可以得到三或四块角片, 有的更多达五、六块。在 Star Carr 遗址, 总共发现了 83 件鹿角, 由它们的主枝上取得了大约 220 块角片, 另外由眉枝上又得到另外几十块角片。由主枝得到的角片的长度可以超过 22 英寸(将近 56 厘米), 70% 的标本超过 15 英寸。在 Star Carr 遗址中, 用角片作毛坯制成的标枪头(Spearheads)可以长达 14.5 英寸, 六分之一的标本超过 12 英寸。一般说来, 由主枝上切割下来的一块角片可以加工成两件带倒钩的尖状器(Barbed point), 所以每一件鹿角平均可以生产出五或六件尖状器。

在德国的 Meiendorf 遗址和 Stellmoor 遗址(Hamburgian level)发现了大量驯鹿角标本, 从它们的主枝上取下了许多纵长的角片。这里先用燧石雕刻器刻出沟, 然后用一种称之为 Zinken 的石器往深里切割, 最后用鹿角或骨头的楔子把角片撬出来。在 Meiendorf 遗址发现的燧石石器中, 雕刻器占了 18.3%, 而 Zinken 占了 21.2%, 两者加在一起占了

将近 40%。

在 Clark and Thompson 的文章中, 列举了 41 处发现沟裂技术证据的地点, 其中英国 1 处, 丹麦 3 处, 德国 6 处, 瑞士 1 处, 前捷克斯洛伐克 1 处, 法国 20 处, 西班牙 9 处。每个地点都记录了鹿的种类(赤鹿或驯鹿)以及有沟裂技术痕迹的标本的数目, 其中数量最多的地点是 Star Carr, 多达 83 件。

从时间上来说, 沟裂技术的使用至少可追溯到奥瑞纳时期(图 1 之 3)。在马格德林文化(Magdalenian)的较晚时期, 这种技术流行于从西班牙北部到中欧的广大地区, 而且在紧挨这一地区的北面, 流行于从勃兰登堡的哈弗尔湖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东普鲁士的 Tunnel-valley 的 Hamburgian 的驯鹿狩猎者中。在苏联南部和西伯利亚, 沟裂技术被用于猛犸象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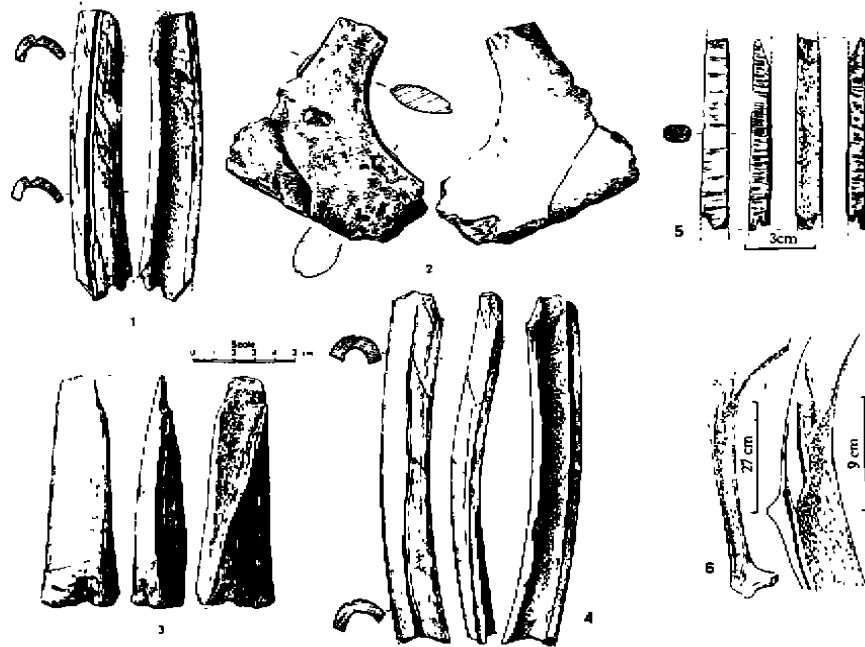


图 2 Abri Pataud 的 Level 3(1—5)和 Stellmoor 的 Hamburgian level (6)中发现的有沟裂技术痕迹的材料
Groove and splinter technique found in Abri Patud Level 3(1—5) and Stellmoor Hamburgian level (6)

1. 驯鹿角的一部分, 上面有斜的刻痕, 这是在以沟裂技术切割以前作的。注意: 上面有尚未刻完的沟。
2. 切割驯鹿角, 用沟裂技术割成环形。
3. 驯鹿角做成的楔子, 近端和一侧自然破去。
4. 以沟裂技术切割的驯鹿角的一部分。注意上面尚未刻完的沟。
5. 驯鹿角做的小棍的一部分, 截面似矩形; 遭到过强烈的切割, 三个面上有大致平行的线条。
6. 驯鹿角的主枝, 从其上已取下三块角片: Ahrensburg 附近的 Stellmoor 遗址的 Hamburgian level。

(1—5 依 Bricker and David, 1984; 6 依 Clark and Thomopson, 1953)

在冰期后的开始阶段, 法国南部和比利牛斯地区的 Azilians 以及北海地区的

Proto-Maglemosians 为了生产鱼叉和其他类型的带倒钩的尖状器, 继续使用这种技术於赤鹿角。在欧洲中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阶段, 这种技术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在继续使用这种技术的地区, 主要被用於骨头而不是鹿角。在阿尔卑斯山和西波罗的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 这种技术还在使用, 虽然其重要性已进一步下降。在现代, 这种技术还存在于北美从阿拉斯加到哈得逊湾的爱斯基摩人中, 共生的有燧石雕刻器, 更晚则有铁制的雕刻器。

在近年来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 同样发现了具有沟裂技术痕迹的材料。例如前面提到过的 Abri Pataud 遗址, 在 Level 3(Perigordian VI)中出土了 15 件用沟裂技术加工过的鹿角(图 2 之 1—5), 共生的有许多骨、角、象牙器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层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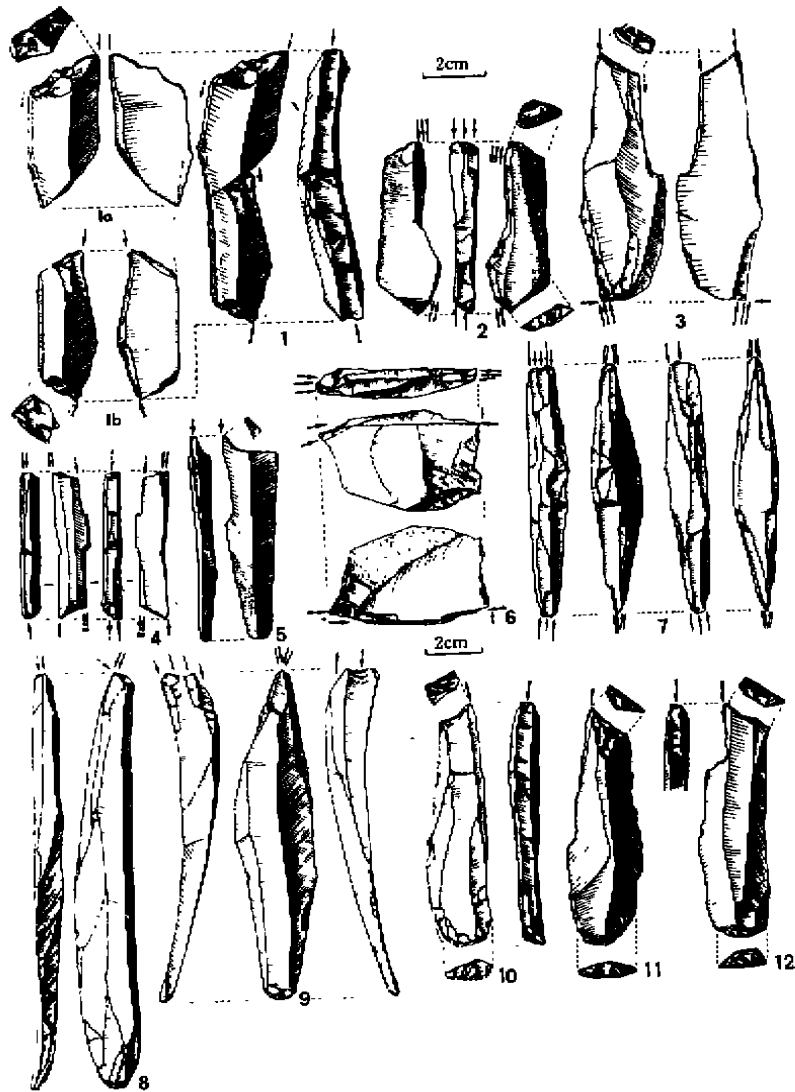


图 3 Abri Pataud Level 3 的雕刻器 Burins found in Abri Pataud Level 3
(依 Bricker and David, 1984; 比例尺: 1—3 同, 4—12 同)

发现了类型达 16 种之多的雕刻器 411 件, 占全部石器组合(1309 件)的 31.39%(图 3)(Bricker and David, 1984)。

与欧洲的情况相对照, 在中国史前时期的骨角工业中, 迄今似乎尚未发现有使用楔劈技术和沟裂技术的材料。

例如, 在贵州兴义县的猫猫洞遗址, 出土骨器 6 件, 角器 8 件。制作骨器的原料多采用较厚的动物骨骼的碎片, 制作角器的原料则是从鹿角上剥砍下来的。有一件角铲(标本 0003 号), “标本下端有剝切的痕迹, 断口显得不平齐, 这是用石器剝斫的必然结果”。另一件两面加工的角铲(标本 0004 号), “其下端的大部有剝痕, 系斜向剝斫的结果, 角中心部有不整齐的一道凸棱。此痕迹暗示, 这件标本的大部经砍斫后并未剝断, 而后用力将它剝断”(曹泽田, 1982b)。

还有如贵州普定县穿洞遗址, 发现大量骨器和一些角器。骨器(不包括大量的打击骨器)至少有 600 件。遗址分早、晚两期。95% 以上的骨器出自晚期, 其生产过程“大体经过选材、劈裂、打琢粗坯、刮削成型, 最后磨制定型”。晚期也出土一些角器(角铲), “其加工程序是截鹿角的一段, 而后在其一端单面刮削, 使成一斜刃, 刃角约 45° , 是有效的挖掘工具”(张森水, 1983)。

再看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西安半坡遗址, 曾获得数千件骨角工具。取得毛坯的方法是“将骨材或角料劈成或锯成制作器物所要求的骨条或骨片”。例如, 制作“比较粗糙的锥刺工具, 如不规则形的锥子, 是把残断的骨条或骨片用砸击法使之破裂, 选择其中有尖端的磨光成锥尖”; “大型的工具, 如铲、凿和刀, 多用兽的长骨劈成两半, 或利用肩胛骨, 先加以刮削修治, 使之成为所需要的形状, 再加以磨光”; “比较规则一些的长方形铲或平头凿, 是将长骨或管状骨的半面砸击或用刀切削去, 然后加以磨制”。至於角制品, “在处理角材时, 多用锯切法, 其他工序皆同骨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 1963)。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 有两种制作骨器的方法: 一种是利用兽骨和鹿角的自然形态, 一般只需经过少许或简单的加工, 就能够直接作为骨器使用; 另一种是利用大、中型兽类的坚硬、厚实的管状骨来加工成各种骨器, 即先将管状骨破成条, 再经过细致的琢磨或钻孔, 最后成器。

单就角器的制作来说, 十分简单, “将枝角从主枝上砍割下来就可以说是一件现成的锥形器; 若将尖端再磨成刃状, 就是一件凿形器; 若是将中部琢磨成孔或倒钩, 就成为梭形器。粗大而结实的四不像鹿角, 后枝长而直, 横切面圆形, 很适于用手把握, 只要将后枝和前枝的分叉部分保留下来, 略加修整, 装上石斧或石磷, 就成为一件非常适用的砍削复合工具”(魏丰等, 1990)。

还有如江苏邳县刘林遗址, 出土骨角器 129 件, 大多数是完整的。另外也发现了骨、角、牙料。“骨、角料是在一些鹿角上或兽的腿骨上有砍锯痕多处, 它们是作为工具的原料用的”(江苏省文物工作队, 1962)。

由此可见, 在史前时期, 中国和欧洲在制取骨角器的坯料的方法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在欧洲使用的是楔劈技术和沟裂技术, 而在中国使用的是砸、砍、劈、剝、锯等方法。

二

如上所述,在欧洲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在骨角工业中使用了楔劈技术和沟裂技术。而在楔劈技术和沟裂技术中使用的主要石器工具是雕刻器。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组合中,雕刻器相当发达,种类多,数量丰富,在石器组合中占的比例很高或较高,常常成为主要的石器类型之一。难怪人们常常把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称之为“石叶和雕刻器文化”(Clark and Thompson, 1953)。

在 Sonnevile-Bordes and Perrot (1953)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类型表中,有 18 种雕刻器,还有三种包含雕刻器的复合类型(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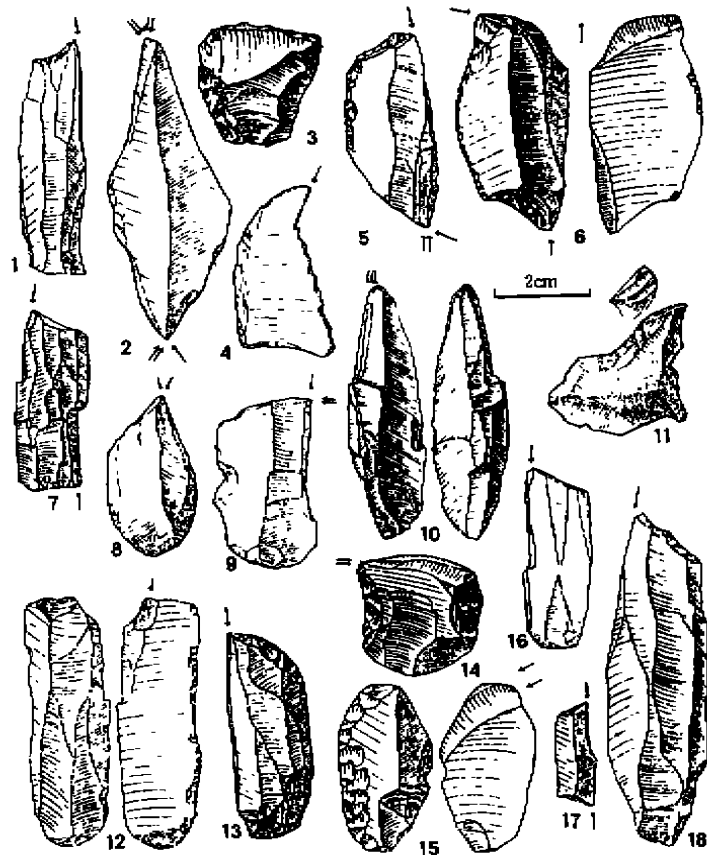


图 4 欧洲雕刻器的种类 Kinds of burins found in European Upper Palaeolithic

1. Burin sur troncature retouchée concave. Plateau Gabrol, Périgordien supérieur. 2. Burin dièdres multiples. Laugerie-Basse, Magdalénien. 3. Burins sur troncature retouchée droite. Masnaigre. 4. Burins bec-de-perroquet. le Souey, Magdalénien supérieur. 5. Burin multiple mixte. Roc Saint-Cirp. Magdalénien III. 6. Burin multiple sur troncature retouchée. Beauregard, couche inférieure, Magdalénien ancien. 7. Burin nucléiforme. Masnaigre, Périgordien supérieur. 8. Burins dièdres déjetés. Laugerie-Basse, Magdalénien. 9. Burins dièdres d'angle. Masnaigre, Périgordien supérieur. 10. Burins

diedres droits. Masnaigre, périgordien supérieur. 11. Burins busqués. Cro-Magnon, Aurignacien typique. 12. Burin plan. Le Placard, Solutréen. 13. Burin sur troncature retouchée convexe. Cro-Magnon, Aurignacien typique. 14. Burin transversal sur encoche. Masnaigre, Périgordien. 15. Burin transversal sur troncature latérale. Beauregard, couche inférieure, Magdalénien ancien. 16. Burins d'angle sur cassure. Labattut, Périgordien supérieur. 17. Burin de Noailles. Masnaigre. 18. Burin sur troncature retouchée oblique. Labattut, Périgordien supérieur.

(依 Sonnevile-Bordes et Perrot, 1956)

表 1 中列举数例, 以示雕刻器在欧洲某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石器组合中的数量和所占比例。

表 1 欧洲若干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组合中的雕刻器的数量和比例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burins found in some European Upper Palaeolithic assemblages					
地 点	文 化	石器数量	雕刻器数量 ¹⁾	雕刻器指数 ²⁾ 或比例	参考文献
Roc de Gavaudum, Gavadum (Lot-et-Garonne) ³⁾	Périgordien supérieur	680	324	47.66	Ferner et al., 1973
Saint-Georges-des-Agouts (Charente-Maritime)	Périgordien supérieur	542	320	59	Moisan, 1981
Laussel, Grand et Petit abris	Aurignacien moyen	4795	959	20	Lalanne et al., 1946
Laussel, Grand et Petit abris	Aurignacien supérieur	10621	3399	32	
Fourneau-du-Diable, terrace supérieure	Solutréen supérieur I	1110	49	4.4	Sonneville-Bordes, 1954
	Solutréen supérieur II	785	11	1.4	
	Solutréen supérieur III	1010	67	6.6	
La Madeleine	Magdalénien IV	3700	1857	50.2	
La Madeleine	Magdalénien V	3010	1827	60.7	
La Madeleine	Magdalénien VI	4986	2259	45.3	
Abri du Soucy	Magdalénien VI	1584	1209	76.02	Lovaff, 1974
Maisieres (Belgique)	Périgordien	937	401	41.09	Otte, 1976
Trou de Chaleux (Belgique)	Magdalénien	2921	638	21.84	Sonneville-Bordes, 1961
Altamira (Espagne)	Solutréen	522	109	20.8	Straus, 1978
Moosbühl (Suisse)	Magdalénien final	1463	394	26.95	Sonneville-Bordes, 1963
Petersfels (Germany)	Upper Magdalénien	3207	767	23.93	Bhattacharya, 1979
Arka (Hungary)	East Gravettian	c. 1200	c. 245	20.39	
Dolní Vestonice (Czechoslovakia)	Gravettian	1906	535	28.05	

1) 雕刻器数量是根据石器数量和雕刻器指数或比例计算出来的。 2) 雕刻器指数 = 雕刻器总数 × 100 / 石器总数。

3) 凡未注明国名者, 均系法国的地点。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工业中, 雕刻器的数量是相当之多的, 其在石器组合中所占的比例有时是相当高的。

与此成强烈对照的是, 在中国同时期的石器工业中, 雕刻器很不发达, 类型比较少 (主要有笛咀形或屋脊形雕刻器、角雕刻器和平刃雕刻器等), 数量很少 (图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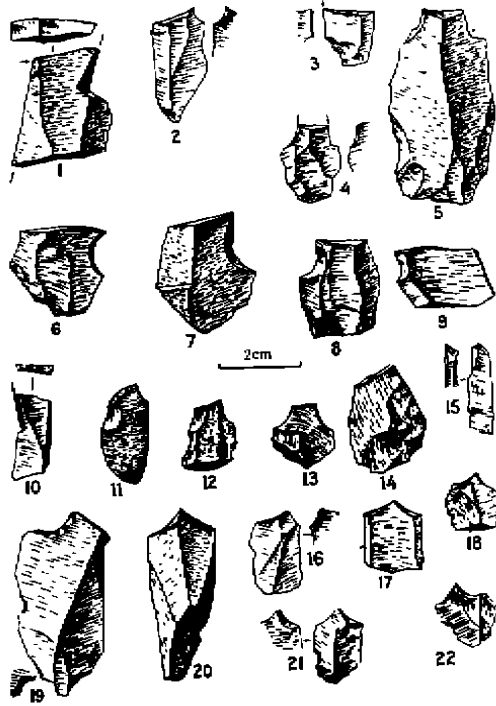


图 5 水洞沟发现的雕刻器

Burins found in Shuidonggou(Choei-Tong-Keou)

(依 Boule, Breuil, Licent et Teilhard, 1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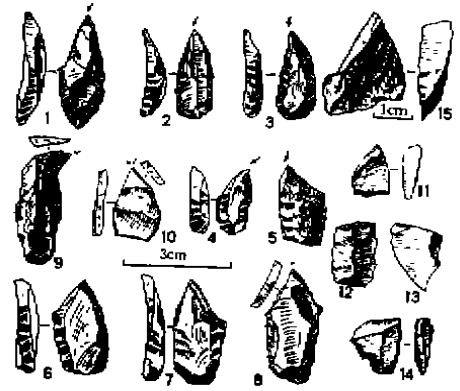


图 6 下川 (1—10) 和萨拉乌苏 (11—15) 发现的雕刻器

Burins found in Xiachuan and Salawusu
(依王建等, 1978; Boule, Breuil, Licent et Teilhard, 1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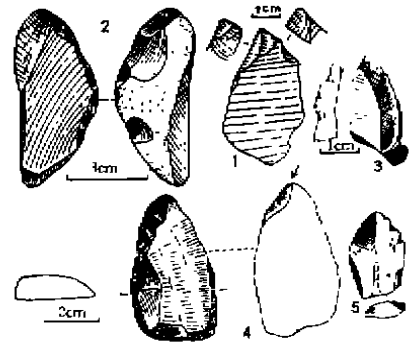


图 7 中国南方各地点发现的雕刻器

Burins found in localities of South China

表 2 根据不完全统计列出了发现雕刻器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和雕刻器的数量。

由表 2 可知, 除了数量不详的地点以外, 北方和南方 19 个地点加在一起总共发现雕刻器 114 件, 其中出土 10 件以上(含 10 件)的地点仅 3 处, 5 件以下(含 5 件)的地点有 12 处, 自 8 个地点只发现 1 件。

就雕刻器在石器组合中所占的比例而言, 在石器总数超过 100 件的地点中, 只有虎头梁的比例稍高, 也仅有 10% 左右。以下依次为富林 5.88%; 大同小站 2.91%; 下川 1.79%; 蒲县薛关 1.76%; 普定白岩脚洞 0.98%; 环县刘家岔 0.82%; 山东日照地区 0.75%; 兴义猫猫洞 0.20%。

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如此方的小南海(安志敏, 1965)、韩城禹门口(刘士莪、张洲, 1984; 刘士莪, 1987), 南方的普定穿洞(张森水, 1983)、威宁草海(吴茂霖等 1983)、马鞍山(张森林, 1988)樟脑洞(黄万波等, 1987)、资阳人 B 地点(李宣民、张森水, 1984)、铜梁张二塘(李宣民、张森水, 1981)、柳州白莲洞(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等, 1987), 则完全没有发现雕刻器。

所以, 总起来看,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工业中, 雕刻器数量很少, 其在石器

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也很低，从未成为石器组合中的主要成分。与欧洲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特点，可能与骨角器和艺术品工业不很发达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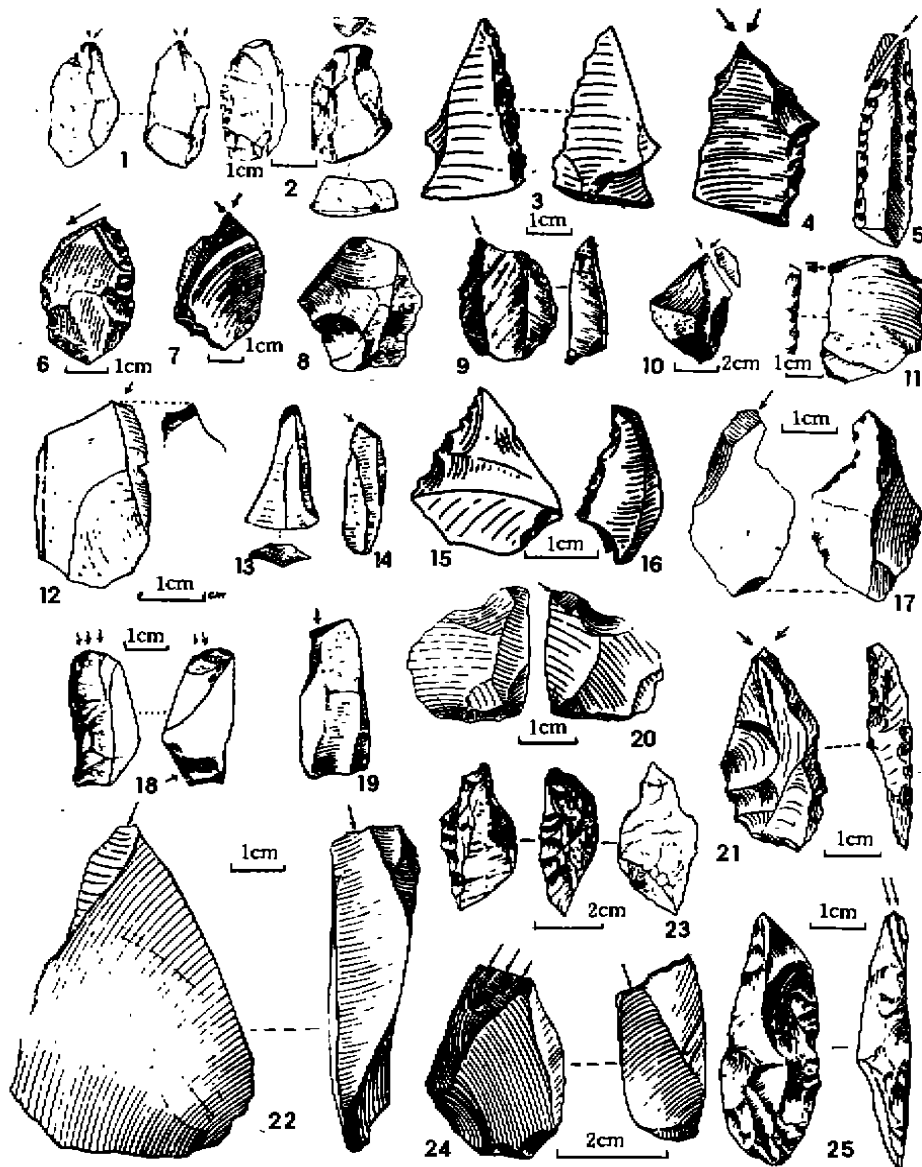


图 8 其它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发现的雕刻器 Burins found in other Late Palaeolithic localities

1、2、11、曲沃西沟；3、4、15、16 峙峪；5、6 阳原油房；7、水洞沟(1980年发掘)；8、12—14、18、19、昂昂溪大兴屯；9、环县刘家岔；10、日照；17、大同小站；20、迁安瓜村；21、凌源西八间房；22、24、虎头梁；23、庆阳巨家塬；25、蒲县薛关。(比例尺：3、4同15、16；5同6；8、13、14、19同12)

(依刘源, 1986; 贾兰坡等, 1972; 谢飞、成胜泉, 1989; 宁夏博物馆等, 1987; 黄慰文等, 1984; 甘肃省博物馆, 1982; 尤玉柱等, 1989; 李超荣等, 1986; 张森水, 1989; 辽宁省博物馆, 1973; 董培、卫奇, 1977; 谢骏义、张鲁章, 1977; 王向前等, 1983)

表 2 发现雕刻器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

Chinese Late palaeolithic localities with burins			
地 点 Locality	石器数量 Number of tools	雕刻器数量 Number of burins	参考文献 Reference
水洞沟	数量不详	数量不详 ¹⁾	Boule et al., 1928; 宁夏博物馆等, 1987
萨拉乌苏	数量不详	数量不详 ²⁾	Boule et al., 1928; 黄慰文、卫奇, 1981
峙峪	数量不详	数量不详	贾兰坡等, 1972
海城小孤山	数量不详	数量不详, 报告 图版中示一件	张镇洪等, 1985
环县刘家岔	487	4	甘肃省博物馆, 1982
庆阳巨家塬	8	雕刻-尖状器一件	谢骏义、张鲁章, 1977
下川	949	17	王建等, 1978
蒲县薛关	227	4	王向前等, 1983
阳原油房	45	3	谢飞、成胜泉, 1989
曲沃西沟	94	8	刘源, 1986
大同小站	343(其中 24 件出自地层)	10	李超荣等, 1986
凌源西八间房	数量不详	钝背雕刻器 1 件	辽宁博物馆, 1973
昂昂溪大兴屯	19	9	黄慰文等, 1984
虎头梁	364	37	盖培、卫奇, 1977
榆次大发	14	2	高星等, 1991
山东莒南山乡 九顶莲花山	数量不详	1	员晓枫等, 1989
山东日照地区 (7 个地点)	132	1	尤玉柱等, 1989
富林	119	7	张森水, 1977
兴义猫猫洞	493	1	曹泽田, 1982a
普定白岩脚洞	508	5	李炎贤、蔡回阳, 1986
马鞍山南洞	32(洞外回收采集)	1	黄泗亭等, 1992
资阳鲤鱼桥	12	1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 1983
迁安爪村	5	1(?)	张森水, 1989

1) 步日耶(Boule et al., 1928)在文中图示了 20 余件雕刻器; 在 1980 年发掘中, 雕刻器“数量很少”(宁夏博物馆等, 1987); 有的学者认为, “步日耶说的雕刻器是不典型的”(邱中郎、李炎贤, 1978)。

2) 步日耶说, 萨拉乌苏的雕刻器比水洞沟的要少, 在文中图示了 5 件; 黄慰文、卫奇(1981)指出: 雕刻器的“数量很少, 类型亦很单调”。

参 考 文 献

- 王建、王向前、陈哲英, 1978, 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 (3): 259—288。
- 王向前、丁建平、陶富海, 1983, 山西蒲县薛关细石器。人类学学报, 2 (2): 162—171。
- 尤玉柱等, 1989, 山东日照沿海发现的旧石器及其意义, 人类学学报, 8 (2): 101—106。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 1963, 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十四号,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宁夏博物馆、宁夏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 1987, 1980年水洞沟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4): 439—449。
- 辽宁省博物馆, 1973, 凌源西八间房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1 (2): 223—226。
- 北京大学历史系统考古教研室、四川省博物馆, 1983, 四川资阳鲤鱼桥旧石器地点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3): 331—346。
- 甘肃省博物馆, 1982, 甘肃环县刘家岔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 (1): 35—48。
-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 1963, 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 (6): 308—318。
- 刘士莪, 1987, 韩城禹门口旧石器之研究。史前研究, (2): 15—21。
- 刘士莪、张洲, 1984, 陕西韩城禹门口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史前研究, (1): 45—55。
- 刘源, 1986, 山西曲沃县西沟新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 5 (4): 325—335。
- 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广西民族学院历史系, 1987, 广西柳州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报告。南方考古, 第一辑: 143—160。
- 安志敏, 1965, 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 (1): 1—27。
- 邱中郎、李炎贤, 1978, 二十六年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古人类论文集, 第43—66页。科学出版社, 北京。
- 李宜民、张森水, 1981, 铜梁旧石器文化之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 (4): 359—371。
- 李宜民、张森水, 1984, 资阳人B地点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 3 (3): 215—224。
- 李炎贤、蔡回阳, 1986, 贵州普定白岩脚洞旧石器时代遗址。人类学学报, 5 (4): 162—171。
- 李超荣、解廷琦、胡平, 1986, 大同市小站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 5 (4): 336—345。
- 吴茂霖、张森水、林树基, 1983, 贵州省旧石器新发现。人类学学报, 2 (4): 320—330。
- 宋文薰, 1969, 长滨文化——台湾首次发现的先陶文化(简报)。中国民族学通讯, (9): 1—27。
- 员晓枫、徐淑彬、吴瑞吉, 1989, 山东莒南发现的石制器。人类学学报, 8 (1): 32—38。
- 张森水, 1977, 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5 (1): 14—27。
- 张森水, 1983, 贵州的新发现及其对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的意义。贵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3): 15—24。
- 张森水, 1988, 马鞍山旧石器遗址试掘报告。人类学学报, 7 (1): 64—74。
- 张森水, 1989, 河北迁安县瓜村地点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 8 (2): 107—117。
- 张镇洪、傅仁义等, 1985, 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 4 (1): 70—79。
- 高星、尤玉柱、吴志清, 1991, 山西榆次大发旧石器地点。人类学学报, 10 (2): 147—154。
-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 1972, 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1): 39—58。
- 曹泽田, 1982a, 猫猫洞旧石器之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20 (2): 155—164。
- 曹泽田, 1982b, 猫猫洞的骨器和角器。人类学学报, 1 (1): 36—41。
- 黄万波、徐晓风、李天元, 1987, 湖北房县樟脑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 6 (4): 298—305。
- 黄泗亭、龙凤骧、安家琰, 1992, 马鞍山南洞旧石器文化遗址试掘报告。人类学学报, 11 (1): 69—78。

